

论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

娄 伟

[摘 要] 经过 60 余年的物质性和社会性成长,中国的国家实力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中国实力的增长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退使中美之间出现了权力转移现象。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对现存国际秩序持基本满意的态度,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未必引起冲突与战争,权力能否和平转移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判断。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并不意味着中崛美落,而是中美和其他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一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大国崛起; 权力转移; 中美关系; 均势; 国际体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3-7411.2011.04.005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1)04-0037-(7)

[收稿日期] 2011-03-25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和平发展与东亚合作机制构建”(2009B042)

[作者简介] 娄伟(1971-),男,吉林通化人,漳州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博士。(漳州 363000)

新中国经过 60 余年的物质性和社会性成长,已经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强国,开始进入国际体系的核心。中国实力的增长和美国权势地位的相对衰退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问题。本文首先通过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梳理,总结出权力转移的基本表征和决定权力转移方式的分析变量,并由此展开文章的二、三部分,即根据该基本表征说明中美之间已经开始了权力转移进程,并使用该变量来验证中美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

一、权力转移理论及其研究变量

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是指“由于世界政治中国家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地位下降,而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的权力变化过程”。^[1]权力转移理论最早由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在 1958 年出版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书中提出。权力转移理论主要关注国际体系中权力转移时期现存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权力对比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二者之间的战争与冲突问题。权力转移理论基本上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同样假设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行为体,其主要目标是保证国家安全和寻求国家权力与利益最大化。与现实主义理论假设的不同之处在于,权力转移理论否定了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假设,认为与国内政治体系的组织形式相同,国际体系也是分等级的:体系的顶端是权力主导国,中间是几个实力相当的大国,处于底层的是更多数量的中等国家和小国。体系主导国通过其强大的实力来制定能够维护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和行为规范,一方面保证其安全,另一方面来维持体系的正常运作。

虽然权力转移理论假定国际体系是分等级的,但是,国家之间的等级划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家权力的此消彼长,大国的等级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权力转移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于国内因素,包括一国所具有的经济增长率、政府效能、工业化水平、人口数量等等,而不是军事同盟等外在因素。“工业革命改变了国家相对权力增长的方式,它使权力迅速转移成为可能,从而使得国家可能在国际等级秩序中相对快速的上升。非工业化国家凭借它们的人口和资源优势,通过政治和经济发展迈向工业化是促成权力转移的根本原因”。^[2]

权力转移理论除了关注“工业化速度不同导致权力转移”之外,更要关注权力转移与战争和冲突的关系。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战争是否爆发的分析变量有三个:均势、超越和不满。^{[3](6)}就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实力对比而言,与均势理论所主张的“势力均衡将导致和平”不同,奥根斯基认为当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权力分配接近、特别是当大国间权力的再分配出现“持平”(power parity)趋势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是最高的,^[4]而在挑战国与主导国势均力敌之前,或者挑战国推翻原主导国并确立自身统治地位之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极低。^{[3](5)}就崛起国对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而言,满意还是不满意是解释国际体系以何种方式转换的关键变量,如果崛起国对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准则满意的话,即使其实力超越了主导国的力量,和平也可以得以维持,而不满现状的崛起国在与主导国势均力敌之前也不会挑起战争。^{[3](6)}奥根斯基对战争爆发关键变量的解释与罗伯特·吉尔平的观点是一致的,后者认为,“如果一种国际体系中权力比较大的国家对现有的领土、政治和经济安排满意的话,这种体系便处于平衡状态”。^{[5](18)}

在“均势”、“超越”和“不满”三个变量中,“不满”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关键变量。那么如何衡量崛起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满意程度呢?本文认为,衡量崛起国满意还是不满意的三个标准是:1.崛起国在全球或区域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崛起国参与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程度表明了崛起国对国际规范、国际准则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参与的程度越高,意味着满意度越高。2.崛起国与全球或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特别是与体系主导国的依赖程度。相互依赖使行为体之间形成了广泛的制度网络,共有利益的实现具有更大的可预期性。3.体系主导国对崛起国所采取的战略。如果主导国能够尊重崛起国的核心利益,对崛起国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那么崛起国就有可能采取和平方式实现崛起。学者认为,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就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6]

继奥根斯基以后,道格拉斯·莱姆基(Douglas Lemake)对权力转移理论有所发展。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对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是以整个国际体系为背景的,道格拉斯·莱姆基把这一理论延伸到区域体系中,认为区域体系也存在着等级,也有主导国、中等国家和弱小国家之分,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依然是超越、均势和不满,在中东地区和远东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3](8)}斯蒂文·陈(Steven Chan)则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命题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权力转移并不是体系战争发生的必要条件,关键变量是国际体系的利益分配是否和变化后的权力分配格局相适应。另一方面,体系战争也有可能由主导国发起,这主要是由主导国对崛起国的认知和政策所决定。^[2]

二、中美之间开始权力转移进程了吗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常常把权力转移理论应用于中国崛起对美国权势、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影响的分析之中。^[7]学者普遍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已经对美国的权势地位构成了挑战,但是,在中美之间是否已经开始了权力转移问题上,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只是对美国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中美之间未必会出现权力转移;^[8]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正处于权力转移理论中的酝酿期,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9]也有的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已经开始的一个漫长过程,^[1]本文赞同此看法,理由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美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增长缩小了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

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是一国获得权力的基础性因素。额外的经济资源能够发展成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权力替代能力。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之间在经济增长率上的不同。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年均 10% 左右的增长率,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世界产值中所占比例从 1980 年的 3.4% 增加到 2005 年的 15.4%,然而美国一直保持在 21% 的水平。中国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例也持续增加,从 2003 年的 2.5% 增加到 2006 年的 8%,而美国从 1993 年的 12.6% 减少到 2006 年的 8.6%。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进口中所占的比例从 1993 年的 2.8% 增加到 2006 年的 6.4%。^[10]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国外学者预测,按照目前中美双方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在未来 20 到 30 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赶上美国,到 2075 年中国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国家。^[11]

为了搭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经济伙伴,“到 2006 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重要的直接投资对象,因此,为了获得经济稳定和持续经济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更多地依赖于与中国而不是与美国的合作”。^[12]中韩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使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进一步强化,在韩国一度出现了“疏美亲华”的话题,^[13]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也迫使日本更加重视东亚,日本民主党执政后,出于对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国家市场的需求,日本提出了以中日韩三国为基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14]中美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关系的变化,无疑使中国获得了更大的相对权力。

(二)美国的过度扩张和过度公私消费侵蚀了美国实力的基础

美国权势的流失除了“新兴国家崛起”等外部原因之外,也有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在这些内部原因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是“帝国的过度扩张”,而另一个是“过度的公私消费”。帝国的过度扩张是指“国家由于自身的好战行为而遭到他国的围堵,或由于自身错误而陷入边缘地带的泥潭,抑或两者兼而有之”。^[15]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在现代社会,国内巩固和世界市场的经济扩张是继领土扩张之外的霸权扩张的主要形式,这些导致了国家力量的增长。但是,一旦进一步的变革与扩张在成本和收益上达到平衡,进一步扩张所获得的收益将小于所付出的成本。^{[5] (151)}此时,进一步扩张将消耗而不是增长霸权国的经济力量,从而导致霸权国的实力衰退。

美国在 2003 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应属于杰克·斯奈德所说的“帝国的过度扩张”。伊拉克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国的国家资源,长时间牵制了美国的精力和注意力。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也使美国丧失了“9·11”事件为美国带来的“道义优势”和“议题优势”。围绕着伊拉克战争的正当性问题,美国国内舆论和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共识陷入了严重分裂,2006 年美国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惨败和在 2008 年总统选举中的失利表明了这一点。在国外,德法这些所谓的“老欧洲”与美国之间也一度产生了间隙。日前,美国已经承认,“撇开”联合国使其付出了高昂代价。^[16]和以往大国的兴衰史十分相似,美国目前似乎也陷入了“帝国战线过长”的困境,对美国来说,过度扩张使它所承担的义务已经大大超出了它本身具有的能力,这将导致美国的衰落。另一个原因是“过度的公私消费”。广义地说,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被分割成三个部分:防务、消费和生产性投资。“防务是指国家安全的费用和保护公民财产的费用;消费是指私人 and 公众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投资则是国民产品的一部分再回到经济生产部门中去,以提高土地、劳动以及现代世界中的工业化生产的效率和生产率”。^{[5] (163)}历史的发展趋向是,随着一个社会的老化,防务和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大,这势必导致生产性投资所占比例的缩小,反过来这更难满足防务和消费的需要,社会进入消费增长、投资下降的螺旋形下降状态,从而损害决定该国国际地位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基础。^{[5] (163)}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公众过度的商品和服务消费。金融危机爆发表明,就“帝国的扩张”来讲,美国已经

陷入了“过度的公私消费”阶段。目前,医疗开支占到美国财政支出的1/4,按照此种趋势发展,到2020年美国的财政收入将无法支付庞大的医疗开支,^[17]这是奥巴马总统力主医疗改革的原因之一。与之相关联的是,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开始缩减其防务开支计划。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决定停产造价昂贵的F-22“猛禽”战斗机。2009年7月21日,美国参议院以58票赞成、4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决定支持奥巴马政府关于停产这一机型的计划,并决定从该院的2010财政年度国防开支授权法案文本中删去有关拨款17.5亿美元用于再添置7架F-22“猛禽”战斗机的条款。^[18]尽管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仍然逃脱不了任何一个在世界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所必须面临的两种考验。一种是:“在军事或战略领域,该大国能否在其预期的国防需求和它所拥有的履行所承担义务的手段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另一种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生产格局,该大国能否在相对的衰落中保持其实力的技术和经济基础”。^[19]伊拉克战争耗费了美国大量的国内和国际资源,加剧了帝国扩张所需成本与所得收益之间的失衡。美国过度的公私消费限制了防务和生产性投资,削弱了维持美国霸权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基础。

(三)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凸显

爆发于2008年下半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世界各国。就遭受打击的程度来看,美国、欧洲和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受到的冲击最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然而,在这种全球大势之下,预计中国的年度经济增长仍将达到6.5%~8.5%(实际增长率为8.7%)。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认为,如今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是一场长期的“结构性”危机,将对世界能源、环境、粮食等基本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主宰世界长达五个世纪的欧美的权力秩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美国依靠强权统治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20]英国《卫报》网站4月20日刊登了马丁·雅克的一篇题为“在经济危机的刺激下,全球强国地位的大变动开始加速”的文章。文章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霸权地位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的“少有的”历史时期,其起止时间应定于2008年,原因在于:首先,奥巴马当选总统标志着美国对自身力量局限性及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必要性的认可;其次,中国在最近30年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它现在显然已经准备在全球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最后,全球金融危机来袭让美国经济实力下降,同时证明美国能否继续占据全球金融霸主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21]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果目前我们还无法完全看清,但是有一点已经很明确,那就是它已经加速了国际权力关系的改变,进一步缩小了中国同美、日、西欧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延续和最新表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所占的分量进一步提高,就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而言,总的趋势应该是美国的实力地位相对下降,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则相对上升。

三、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能否以和平方式实现

有些西方学者依据历史经验和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实力地位正在下降的美国之间存在着冲突甚至战争的风险。^[22]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看法极具代表性,他认为,“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会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使其生存几率最大化的最好方法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米尔斯海默认为,由于巨大水体的阻遏作用,实现全球霸权是不可能的)。”^[23]而另一种观点相对较为客观,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权力转移都意味着冲突和战争,权力转移有多种类型,即使把强有力的中国纳入到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之中,西方秩序依然可以占有优势。^[24]

第一种观点正确认识到了权力分配(即前文所说的“均势”与“超越”)对体系战争的影响,但是,这种观点几乎完全忽视了“崛起国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满意程度”这个分析变量,而这个变量也是决定中

国以何种方式实现崛起的关键变量。第二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这种观点主要是站在西方的角度上来看待问题的,其研究重心是放在如何把崛起的中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之中并保持西方秩序的持续运作。本文把研究焦点放在事物的另一面——崛起国上。依据前文界定的崛起国“满意”还是“不满意”的三个标准,把决定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是否满意的分析变量设定为三个: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中国与美国相互依赖的程度;美国对中国能否采取一种包容战略。

(一)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

在 1977 年之前,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比较低。1977 年之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从 1977 年到 1997 年的 20 年间,中国参与的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 21 个增加到 52 个,增长了一倍多。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参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从 71 个猛增到 1 163 个。^[25]在 1977 年,中国参加的各种类型的政府间组织的数量是美国的 25%、是印度的 3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70%,而到 1996 年这三项数字分别达到了 70%、80% 和 180%。而且在以相应的经济水平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对国际机制的需要程度的标准时,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远超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26]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广泛参与显示出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融入战略,这与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是相一致的。^[27]

(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相互依赖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美经贸关系有了飞速发展。从 1979 年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到 2005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增长了 85 倍,达到 2 840 亿美元;中国的贸易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高,则中国购买美国债券的规模也越大,这就形成了不断扩大的利益共同体。^[28]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持有国;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直接投资国,^[29]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009 年 7 月,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召开了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对话涉及金融危机、地区安全、环境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内容,显示了彼此对对方的重要性。中美之间不仅在经济领域建立了紧密联系,在安全领域二者也存在着共同利益。对美国来讲,没有中国的合作,某些国际重大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为 70 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为 30。到世纪之交,数字就变为 65: 35。伊拉克危机时,特别是金融海啸后,很多北京的战略家认为,这个比率已经变为 60: 40 至 55: 45。^[30]数据变化表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已经开始由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向对称的相互依赖转变,这种转变既显示了中国权力的增长,也使中美两国更加紧密的相互依存。

(三)美国对中国能否采取包容战略

对美国战略家来讲,可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实力的增长,而是中国以何种方式使用增长后的实力。对中国来说,以何种方式显示实力,既取决于中国如何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也取决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华所采取的政策。“决定中国未来战略意图和‘权力转移’进程突变的关键变量并非是中国政策的本身,更多的可能是其他国家究竟怎么对待中国和实行怎样的对华政策。允许和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合理与正当利益、欢迎中国的强大与发展,诸多这些外界反应无疑将有利于中国推行合作与和平的外交政策,并强化这种政策的中国国内基础,因而有利于持续性发展”。^[31]中国以何种方式实现崛起以及如何使用其实力,体系主导国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尤为关键。

进入新世纪后,美国思想精英界对中国的认知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经过 20 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由一个体制外、对体制有挑战意义的国家,变成了体制内、有一定发展程度的国家”。^[32]美国原副国务卿佐利克于 2005 年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时提出,中国要做一个“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 2006 年 9 月 13 日在美国财政部讲话时说“鉴于其规模和在世界市场中的角色,中国无疑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领导国家,并且值得作为一个领袖来对待”;现任国务卿希拉里也将

中美关系形容为“同舟共济”。

除了主观上对中国的认知有了积极的变化以外,在客观上美国也较难对中国采取遏制的政策。就国内来讲,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到其国内利益集团的制约,比如,正是在支持稳定中美关系的工商利益集团的游说下,1994年5月,克林顿政府宣布贸易与人权“脱钩”。^[33]在东亚,由于美国的盟友大都看重中国的经济机会,即便是美国想要采取遏制政策的话,也很难获得支持和认同,比如,东盟在中美之间就采取了大国平衡战略,其想法是“既想从中国正在增长的经济力量中获取利益,同时也继续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34]

使用以上三个变量进行验证的结果表明,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实际参与的国际制度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现有国际规范已经内化到中国的国家认同当中。中国与美国的相互依存使中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些使美国的战略学界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并且变化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中国认知的变化,也会导致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在中国不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如果美国对中国崛起能够采取包容的态度,那么,中美之间的权力和平转移就有可能实现,从目前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四、结语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使中美之间开始了权力转移进程。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等变革性因素促动下,中美权力转移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中崛起美落”,而是中国成长为世界一极,与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一道共同发挥重要作用,即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并不意味着霸权的转移,而是中国以自身的发展来推动世界多极化和民主化进程,在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对现存国际秩序持基本满意态度的前提下,这个进程的实现,将更多地取决于美国的对华战略。

参考文献

[1]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Chapter 1. 转引自:朱锋,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

[2] 张骥.权力和平转移的条件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条件[J].国际观察,2006(4):41-46

[3] 杰克·S.利维.权力转移理论和中国崛起[A].朱锋,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C].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6-8

[4]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Alfred A. Knopf, 1958, Ch. 1. 转引自:朱锋.“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 [J].国际政治研究,2006(3):19-26

[5]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8,151,163

[6] Zhiquan Zhu US-China relations in 21st centur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54-87

[7] ETH Zurich. The Rise of China Regional and Global Power Shift[J].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CSS), Vol. 2 No. 8, February 2007, pp. 1-3; Ronald Tan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p. 31-55; 时殷弘.美国权势、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J].国际政治科学,2005(3):28-38

[8] Baohui Zhang. American Hegemony and China's U. S. Policy[J]. Asian Perspective, Vol. 28 No. 3, 2004, pp. 87-113

[9] 张春.权势和平转移与中国对美战略选择[J].教学与研究,2007(3):65-72

[10] 中国正在拯救当今资本主义[N].参考消息,2009-07-09(16).

[11] 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J].国际政治科学,2005(3):1-20

[12] 罗伯特·S.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11):36-43

[13] 李元烨.“疏美亲华”:韩国的热闹话题[J].世界知识,2004(14):39-40

- [14] 周永生,丁安平. 日本鸠山内阁的外交政策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0 (1): 21- 24
- [15] 杰克·斯奈德. 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 [M]. 于铁军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51
- [16] 美承认“撤开”联合国付出高昂代价 [N]. 参考消息, 2009- 08- 14 (2).
- [17] 美国医疗改革 奥巴马志在必得 (上) [EB /OL]. 新华网. [http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2009- 09/12/content_12035814 .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9/12/content_12035814.htm), 2009- 09- 12
- [18] 美参议院决定停产更多 F- 22“猛禽”战斗机 [EB/OL]. 新华网. [http //news .xinhuanet .com /m il/2009- 07/22/ content_11748410 .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7/22/content_11748410.htm), 2009- 07- 22
- [19]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 [M]. 陈景彪等译. 北京: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 [20] 世界进入文明“转换期” [N]. 参考消息, 2009- 02- 05 (3).
- [21] 中美强国地位大转换开始加速 [N]. 参考消息, 2009- 04- 22 (16).
- [22]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J]. Foreign Affairs March /April 1997 ; Robert D. 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J]. Atlantic Monthly April 28, 2005; Steve Chan China the U. S.,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2
- [23]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 [M]. 王义桅, 唐小松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544
- [24]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J].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February 2008 [http //www . viet- studies .info/k inh te/Ch ina_R ise_and_W est_FA .pdf](http://www.viet-studies.info/kinhte/China_Rise_and_West_FA.pdf)
- [25] Aaron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 S. - 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Fall 2005), p14
- [26] 江忆恩. 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若干思考 [A]. 王杰. 国际机制论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452
- [27] 刘中民. 中国的热点外交研究——特点、理念与意义 [J]. 东北亚论坛, 2009, (3).
- [28] 郑必坚. 中美关系的四个战略机遇 [N]. 人民日报 (海外版), 2005- 07- 12 (1).
- [29] 甄炳禧. 合作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 [J]. 国际问题研究, 2009, (1): 16- 25.
- [30] 中国学当“超级大国” [N]. 参考消息, 2009- 05- 07 (16).
- [31] 朱峰, 罗伯特·罗斯. 中国崛起: 理论与政策的视角 [A]. 载朱峰, 罗伯特·罗斯. 中国崛起: 理论与政策的视角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404
- [32] 黄靖. 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演变 [J]. 新远见, 2007, (7): 44- 58
- [33] 庄国波. 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兼论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 [J]. 内蒙古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5): 92- 96
- [34]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责任编辑 富燕妮 许佳〕

On the Power Shift between China and U. S.

LOU Wei

Abstract After 60 years of physical and social growth, China's national strength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Growth of China's power and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power of United States lead to the power shift. Because China insists on peaceful development road and be satisfied with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conflict and war. The peaceful power shift depends on whether the U. S. could contain China's rise. Power shif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all, but China and other major countries or groups of countries a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Key Words rise of great power; power shift; Sino-U. S. relations;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ystem